唐宋，雄霸海上的明州商帮

祝永良

宁波，作为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最早的始发港之一，是“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城市。城因港兴、港通天下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一千多年前的唐宋时期。

据《鄞县志》等文献记载，千年前的明州（今宁波）三江口商帮云集，千帆竞发，江厦码头一带“帆樯如林、镇鼓相闻”“来船去舶，首尾相接”。海商中既有明州商人，也有新罗（今朝鲜半岛）商人、渤海（唐代中国东北地区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商人。他们以明州港为基地，前往新罗清海镇（今韩国全罗南道莞岛郡），日本值嘉岛、博多港，或经泉州、广州绕马来半岛，过印度洋、波斯湾至阿拉伯国家。国外的许多商人、僧侣、学者、官员入唐或入宋时，也都会租（雇）用明州海商的商船和水手。

这些海商带去唐、宋灿烂的物质文明，先进的制度文化，也带回异域的物产与文化，一些民间商人还充当了政府外交使节的角色，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一条重要纽带。

史书中把这些以明州港为基地发展壮大的唐宋海商，统称为“明州商帮”，日本史书中也称“唐商团”“宋商帮”。

张保皋东亚称雄

张保皋是9世纪上半叶海上贸易活动的先驱，他以新罗清海镇和大唐明州港等为基地，在大唐、新罗、日本三国交往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张保皋像。

张保皋（790年—846年），新罗人。因出身低微，在本国没有出头之日，17岁时渡海入唐，加入了徐州地区的武宁军。唐朝诗人杜牧在《樊川文集·张保皋郑年传》中，称他“善斗战，骑而挥枪，其本国与徐州无有能敌者”。因为武艺高强，张保皋在唐朝镇压藩镇势力的战斗中屡建功勋，被升为武宁军小将。

唐朝经历了“安史之乱”后人口锐减，劳动力告急，新罗百姓被海盗掳掠到大唐为奴的情况经常发生。为了打击奴隶贸易，新罗多次请求大唐剿灭海盗，唐政府也多次下诏，禁止买卖新罗奴隶，但这些诏令并没有产生实际效果。

829年，有着大唐丰富打拼经历的张保皋回到新罗，向国王提出：“遍中国以新罗人为奴婢，愿得镇清海，使贼不得掠人西去。”新罗王听后大悦。

清海镇，也就是现在的韩国全罗南道莞岛郡，是新罗的南大门，与济州岛隔海相望。据《新唐书·东夷传》记载：“清海，海路之要也，王与保皋万人守之。自大和后，海上无羼新罗人者。”可见，大和年间（827年—835年），张保皋被国王任命为清海镇大使后，新罗人被卖为奴隶的现象逐渐得到遏制。

新罗王挨给张保皋的一万军队中，有相当部分是当地居民，这些人熟谙海路，掌握航海技术，因此张保皋的清海镇很快发展成为海上贸易基地。不仅如此，在唐生活多年的张保皋还吸收了大量在唐新罗人为自己的商团成员，与他们建立信息、贸易网络。韩国学者金成勋称张保皋商团为“军产结合的综合商社”，就是指这个商团是由熟知航海技术的船员、商人和军人组成的混合团队。

张保皋的商船到大唐沿海，售出新罗货物，再将购得的唐物运往日本交易。他的商团人数众多、船舶坚固，交易规模庞大，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几乎垄断了唐日海外贸易。

明州是张保皋商团向东南沿海拓展贸易的主要港口。从新罗灵岩附近或清海镇出发，经黑山岛，横渡东海，可到达唐鄮县的望海镇（今镇海）。这条航路的开辟，使张保皋的贸易船可直接来到明州。当时的日本学问僧也大多乘坐张保皋的商船，从明州登陆入唐。日僧圆仁在用汉文撰写的日记体著作《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曾提到张保皋及其部下，说他们通晓汉语、日语，圆仁回国时，曾得到这些新罗人的莫大帮助。

张保皋在贸易中，敏锐地发现了陶瓷的奢侈品地位，他不但经营明州产精美的越窑青瓷，还直接从明州带回懂技术的陶工。这些被他带到新罗的明州制瓷工匠，与新罗人一起，成功烧制了“新罗青瓷”，这比日本烧成真正的瓷器要早近三个世纪。新罗从此由青瓷输入国，一跃成为青瓷输出国。今韩国全罗南道康津郡、高兴郡都发现了9世纪至10世纪的青瓷龙窑，证实那里曾是明州越窑技术东传的一个接收点。韩国莞岛清海镇的张保皋城遗址中，还发现了大量明州产越窑青瓷。

840年，神武王之子文圣王欲娶张保皋之女为次妃，朝臣以张保皋出身低微为由加以反对，文圣王因此作罢。张保皋心生怨恨，翌年于清海镇发动叛乱，当年11月被朝廷派来的刺客杀害。

明州海商的崛起

张保皋身亡后，其属下四散流亡海外，其中一部分人跑到日本。鉴于此前有很多新罗流民在日本充当乱民，日本政府加强了对新罗人的戒备，对新罗商人也持不欢迎态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明州商帮应运而生，担当起贸易舞台的主角。

明州海商的崛起，得益于明州城的因港而兴。

唐长庆元年（821年），明州迁治三江口后，构建州城，兴建港口，置官办船场，使明州成为我国造船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那时，上海尚未开拓，杭州因钱江潮冲击不能成港，于是宁波的三江口就成为比较理想的港口。天台山余脉入海后形成的舟山群岛，有效阻挡了宁波的主要风害台风，使宁波港成为一处优质的避风港。宁波港还是大运河与海洋的一个联结点，从宁波港溯姚江而上，到上虞通明坝，可接通浙东运河，越过杭州湾，就与京杭大运河连接。唐朝后期，明州港不但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商港之一，而且还是大唐与日本、新罗之间“东亚贸易”的四大枢纽港（明州、登州、博多津、清海镇）之一。宋代乾道《四明图经》称：“明之为州，实越之东部。观舆地图，则僻在一隅，虽非都会，乃海道辐辏之地。故南则闽广，东则倭人，北则高句丽，商舶往来，物货丰衍。”

唐代明州商帮中最负盛名的是李邻德商团、张友信（一说张支信）商团和李延孝商团。李邻德商团主要往来于明州港与博多津之间，史籍记载其往返百余次。张友信商团主要以日本肥前的松浦郡港为基地经营海运业，参与其事的有30多人。而李延孝商团则活动于明州港和值嘉岛之间，人数达60人。这些明州海商都有着精湛的航海技艺，能熟练掌握东海的气象规律，并开拓出一条航程更短的赴日航线。

这条航线的基本走向是：从明州港起航，向东偏北横渡东海，直抵日本肥前松浦郡的值嘉岛（今五岛列岛），再转航驶向筑紫的大津浦和难波。从日本回中国，则从博多扬帆，先到五岛候风，等顺风时可一口气横渡东海到达明州。来回单程在正常情况下只需5天。

据日本史籍《安祥寺惠运传》记载，唐商最早赴日贸易是在会昌二年（842年）。这年春，明州商人李邻德自明州港驾商船渡海去日本。同年8月24日，李邻德从值嘉岛出发回国，顺便将日本学问僧惠运带到了中国。

该史籍还写到了另一位明州航海家张友信。唐大中元年（847年）六月二十二日，张友信等37人驾船从明州望海镇出发前往日本，“得西南风三个日夜，才归著远值嘉岛那留浦，才入浦口，风即止。”意思就是张友信正确熟练地利用了季风，仅用三天三夜就到达日本肥前值嘉岛，创中日间帆船航速最快纪录。

明州商团到达日本后，一般是直接与日本的太宰府效仿唐制，供明州商团登陆后居住，并在那里开展商贸活动。今日本九州福冈县还保留着鸿胪馆遗址。另外，明州商团在今日本长崎县五岛市福江岛上留有一处客泊地，日本的那留浦则保留着一口明州商人的汲水井。

张友信泛海逐波

日本史籍中，有一部叫《头陀亲王入唐略记》的日记，作者是头陀亲王的随从伊势兴房，内容从唐咸通三年（862年）三月日本天皇敕许头陀亲王入唐写起，一直写到865年6月伊势兴房归国，全文约2000字，是头陀亲王入唐之行的真实记录，也是一份珍贵的唐代航海资料。

头陀亲王又称真如亲王，名叫高岳，是日本平城天皇的第三个儿子，因看破红尘，于822年进东大寺当了一名“头陀”，也就是“苦行僧”。862年，他获得天皇同意入唐学习，同行的有贤真、宗睿等名僧及“船头、控者”等共61名僧俗。

《头陀亲王入唐略记》中说：“仰唐通事张友信，令造船一只。”“唐通事”是日本朝廷授予张友信的一个官名，其职责是替日方就大唐人事等问题进行咨询，与大唐派日人员进行联络。从这一记载看，张友信在日本有较高的名望，头陀亲王入唐，将所乘海船全权委托他打造。

唐代，明州的许多海商既是航海家，也是技术高超的造船师。当时众多遣唐的日本僧人乘坐他们的商船往返于大唐与日本之间。由于“明州造”海船采用钉榫接合技术和多道水密隔舱结构，抗风浪能力强，日使赴唐的船一般也请明州海商打造。除了张友信，唐会昌二年（842年），日本安祥寺学问僧惠运赴唐，所乘的船就是明州海商李邻德花3个月时间，在值嘉岛用大楠木制成的。

到了宋代，明州更是全国造船业的一个重要基地，今宁波战船街就是因宋时为造船场而得名。据《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记载，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年），明州建造了两艘载重量约240吨的“万斛”大型海船，“一曰凌虚致远安济，次曰灵飞顺济，皆名为神舟，自定海（今镇海）绝洋而东。”宋徽宗宣和五年（1123年），又有两艘明州造“万斛神舟”从明州启航到达高丽，其“巍如山岳，浮动波上”，赢得高丽人“倾国瞻观而欢呼嘉叹”。

张友信不负头陀亲王所托，只用8个月时间，就在肥前的柏岛打造了一艘可供60多人乘坐的坚固大船。

863年8月，大船离开鸿胪馆，于19日靠泊值嘉岛。9月3日，随着东北风起，大船开帆向明州进发。《头陀亲王入唐略记》这样写道：

九月三日，从东北风飞帆，其疾如矢，四日三夜驰渡之间。此月六日未时，顺风忽止，逆浪打舻，即收帆投沈石，而沈石不着海底，乃更续储料纲下之，纲长五十余丈，才及水底。此时波涛甚高如山，终夜不息，船上之人皆惶失度，异口同音祈愿佛神，但见亲王神色不动。晓旦之间，风气微扇，乃观日晖，是如顺风，乍嘉行矶，挑帆随风而走。七日午刻，遥见云山；未刻，着大唐明州之杨扇山；申刻，到彼山石丹岙，泊，即落帆下矶。

从以上记载看，船出发后，开始几天顺风顺水，船行如矢。但到了9月6日下午，海上风云突变，海浪像小山一样扑来。张友信立即下令收缩帆篷，向海底抛石锚停泊。可海水太深，石锚根本沉不到海底。张友信又指挥舵师、水手们收起石锚，用长五十余丈的粗绳捆住石锚，再次往海底下沉，终于把大船固定下来。在浪高如山的危急关头，航海家张友信沉着冷静，妥善处置，足见其航海技术高超。

次年4月，随着季节性潮流的到来，张友信又带着一干僧俗返回日本。头陀亲王则先是去了长安，后又南下广州，坐船去佛教的发源地印度求法，不幸在罗越（今新加坡）一带海域遇难。

惠萼搭唐船往返

唐代在长安留学和在各地学法的日本学问僧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从明州登陆奔赴各地的，仅从会昌二年（842年）到咸通六年（865年），登陆明州的学问僧就有惠萼、圆珍等几十人，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灿烂的一页。

惠萼，史书中也称惠谔、惠锷、慧锷、慧萼、慧萼。他至少5次入唐，除第一次从山东上岸，其余均从明州港进出，其入唐次数之多，时间跨度之长，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颇为独特。

惠萼于会昌元年（841年）西渡（一说840年），从日本经新罗在山东半岛登陆，偕弟子到五台山求法。此后，又巡礼泗州（今安徽省泗县）普光王寺，赴杭州盐官县（今嘉兴海宁）拜谒齐安禅师。会昌二年（842年），惠萼从明州乘李邻德的商船返回日本。这是惠萼第一次在中国的活动。

惠萼第二次来唐，是在会昌四年（844年）三月前，从明州上岸后，欲往五台山朝拜，恰逢唐武宗“灭佛”，不得不止步苏州，其间更名“居士空无”，抄写白居易的《白氏文集》。847年，惠萼乘明州海商张友信的船，从明州三江口出发返回日本。他把抄写的《白氏文集》70卷本带回日本，为后世日本吸收汉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今普陀山上有一座“不肯去观音院”，其中供奉的观音像，就源于惠萼。宝庆《四明志》卷十一记载了这么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

又有不肯去观音。先是大中十三年，日本国僧惠谔诣五台山，敬礼至中台精舍，见观音貌像端雅，喜生颜间。乃就恳求，愿迎归其国。寺众从之。谔即肩舁至此，以之登舟。而像重不可举，率同行贾客尽力舁之，乃克胜。及过昌国之梅岑山，海怒风飞，舟人惧甚。谔夜梦一胡僧，谓之曰：“汝但安吾此山，必令便风相送。”谔立而告众以梦。咸惊异，相与诛茅缚室，敬置其像而去。因呼为“不肯去观音”。其后开元僧道载复梦观音欲归此寺，乃创建殿宇，迎而奉之，邦人祈祷辄应，亦号“瑞应观音”。

这件事发生在唐大中十三年（859年）。这一年，惠萼再度入唐，登五台山，于中台精舍迎归观音像，途经明州，乘张友信船回日本。虽然学界对惠萼留观音像于梅岑山（今普陀山）的确切年份尚有争议，但普陀山因惠萼而开山却是毋庸置疑的。因为这段因缘，观音由普度众生的菩萨，演化成为岛民渔业、航海船贾、沿岸渔民的守护神。也因为这段因缘，南宋嘉定六年（1213年），宋宁宗应丞相史弥远所请，指定普陀山为供奉观音的道场，并御赐“圆通宝殿”额。自此历经各代，普陀山共建成200余座寺院，前往参拜的僧俗络绎不绝，观音信仰遍及日本、朝鲜及东南亚等地。

惠萼最后一次入唐是在863年，随日本王子头陀亲王乘张友信船抵达明州，次年4月自明州归国。

头陀亲王与惠萼的大唐之行，让后人知道了唐代宁波曾有过像张友信这样在航海界了不起的人物。

唐商泊岸图，艺术再现了千年前海外贸易的繁荣景象。

李延孝八渡东瀛

明州商团中的李延孝其实是渤海国商人，因为日本政府不欢迎渤海商人，实行贸易限制，李延孝不得不隐瞒其国籍，南下明州经商，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新明州人”。

根据相关文献，从853年初至877年，李延孝至少有8次从明州东渡日本的记录。

最早出现他名字的是在圆珍向太宰府官员申请求得的公验中。853年，日僧圆珍筹划入唐，当年2月和7月，他先后获得两张由日本太宰府发出的类似今日护照那样的公验，第一张记录他坐“大唐商人王超回乡之船”，第二张记录他“共大唐商客王超、李延孝等”入唐。

圆珍的船于当年8月15日抵达福建连江县，据9月28日福州都督府发给圆珍的公验可见，圆珍有一名随从搭李延孝的船返回日本报平安。从以上公验可知，李延孝在853年到过日本两次。

856年，李延孝第三次来往于唐日之间。这一年，日僧圆珍在台州国清寺慕建止观堂和房舍。根据圆珍两年后写的《乞台州公验状》所记，费用的来源除了日本右大臣藤原良房所赠的三十两沙金外，又从856年9月由日本归唐的明州商人鲁景全、刘仕献、李延孝、李英觉4人处募得四千文。

又据圆珍于858年4月1日所写的《再乞公据印信状》，李延孝第四次到日本是在858年，他将留唐5年的圆珍从台州经明州送回日本。

李延孝的船于6月8日从明州出发，6月19日抵达九州西南部的肥前国松浦县，6月22日北上至太宰府。与李延孝同船返回的还有“唐客”鲁景全、李达，“小生”高奉、“大唐客管道衙前散将”蔡辅。李延孝一行的归唐日期为次年3月，即859年。

据《头陀亲王入唐略记》记载，861年8月，真如亲王（即头陀亲王）到太宰府，当时在场的就有李延孝等人，这是文献中可见的李延孝第五次到达日本。

李延孝第六次渡日是在862年。日本平安时代的史书《三代实录》有载：“大唐商人李延孝等四十三人来，敕太宰府，安置供给。”

李延孝第七次到日本是在865年。据《头陀亲王入唐略记》记载，865年6月，李延孝载着宗睿和伊势兴房等，从福州出发，得顺风之便，仅五天四夜便到了值嘉岛。又据《三代实录》记载，7月27日，李延孝等63人驾船一只，到达海岸，日本朝廷“敕安置鸿胪馆，随例供给”。

877年是文献所载李延孝的最后一次东渡。据日本佛教史书《本朝高僧传》记载，这年年底，在唐留学23年的智聪归国，向日本朝廷报告说：“智聪初随留学和尚圆载，乘商人李延孝船过海。俄遭恶风，舶舻破散。圆载和尚及延孝等，一时溺死。时破舟之间有一小板，智聪傥得著乘之……其后亦乘他船，来归本朝。”由此可知，李延孝在带留学僧圆载等人回日本途中，不幸船破身亡，智聪侥幸抓住一块木板，漂到温州海岸，大难不死，不久又乘其他船返回日本。

圆载离唐之际，唐文人皮日休、陆龟蒙、颜萱等均作诗送别。从后来圆珍写给一位唐朝僧人的信中可知，与圆载、李延孝一同遇难的，还有圆珍的好朋友鲁景全和李达。

宋商受宠高丽国

明州的海商队伍在北宋时期继续壮大，到南宋达到一个巅峰。

宋朝规定，商人出海贸易，须于两浙市舶司“陈牒请官给券以行，违者没入其宝货”。自明州市舶司建立后，中外商人的进出口贸易不少经明州签证后放洋。

元丰二年（1079年），宋廷又规定：商人往高丽贸易，资本达5000缗者，明州“籍其名，岁责保给引发船，无引者如盗贩法”，即要在明州市舶司登记姓名、籍贯、贸易对象国，并有当地人担保，在确认无携带违禁物品后，市舶司方发给出海凭证。

一年后，宋廷再次规定：非广州市舶司辄发过南蕃纲船船，非明州市舶司而发过日本、高丽者，以违制论。从此，明州港成为宋与高丽、日本贸易往来的唯一通道。

从1021年至1192年，宋海商往高丽贸易共117次，其中能确知人数的有77次，共计4548人次。这期间，明州商人去高丽贸易动辄百人以上。如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明州商人陈亮和台州商人陈维绩一次性就带着147人经明州港赴高丽贸易。到了12世纪中叶，明州商人赴高丽贸易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

其时，由于北方辽、金的干扰，宋与高丽官方关系中断。于是，明州商人还承担了一些本该由外交使节完成的政治任务。据宝庆《四明志》记载，明州（庆元府）与高丽“礼宾省以文牒相酬酢，皆贾船通之”。如南宋时高宗继位、徽宗皇帝崩于金、宋与金交战获捷等消息，都是以明州牒的方式，由明州商人通报高丽。

为了贸易便利，很多宋商长期居留高丽。据《宋史》记载，高丽“王城有华人数百……因贸船至者，密试其所能，诱以禄仕，或强留之终身”。高丽政府为了留住经商能力强的宋商，甚至不惜许以高官厚禄。这其中有不少是明州商人。

1124年，明州商人杜道济、祝延祚赴高丽滞留不归，明州地方官员向高丽发出明州牒，要求高丽政府归还这些商人。

《高丽史》卷十五记载：“（仁宗二年五月）庚子，宋商柳诚等四十九人来。初，明州杜道济、祝延祚随商船到本国，不还，明州再移文取索。”但高丽王爱才心切，竟上表请求宋廷，希望允许这两位明州商人留在高丽。宋廷也只好顺水推舟，再次派人携明州牒表示准许。杜道济、祝延祚两人成为高丽的“归化宋商”。

孙忠护成寻入宋

孙忠，又名曾聚，是北宋明州的一名海商。从熙宁五年（1072年）到元丰五年（1082年），他先后六次往来于明州与日本之间。其中熙宁六年（1073年）抵日以后，侨居日本经商5年，到元丰元年（1078年）才回到明州。回程中，他将一位叫仲回的日本僧人送到了中国，他的名字因此出现在《宋史·日本国》的记载中。

成寻画像。

《大日本史》卷233则早于《宋史》六年出现孙忠的名字：“四年春，大云寺僧成寻乘宋商孙忠船入宋。”

成寻，是日本平安初期高官（左大臣）藤原时平的曾孙，入宋时为日本岩仓大云寺住持。

孙忠是如何护送成寻入宋的？在成寻的日记体史料《参天台五台山记》中有详细记录。

1072年3月15日，成寻登船后写下了日记的首篇。这艘船的一船头叫曾聚，也就是孙忠。二船头叫吴铸，福州人。三船头叫郑庆，泉州人。与成寻一起入宋的，还有赖缘、快宗、圣秀、惟观、心贤、善久、长明等7名日本僧人。

船在日本海航行5天后，于3月20日过了“高丽国耽罗山”。此后，天下起了雨，刮起了风。22日，船在惊涛骇浪中有惊无险地进入大宋海域。25日下午“始见苏州石帆山”。26日“著明州别岛徐翁山”。27日“著明州黄石山”。但由于这艘船上有福建商人搭载的货物，船在进入明州海域后又辗转驶向了岱山岛，直到4月4日才进入明州。

成寻入宋已是62岁高龄。在宋都汴梁，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礼遇，神宗皇帝亲自召见于延和殿，并赐紫衣、绢帛等物，敕馆于京都太平兴国寺传法院。成寻留宋9年，于宋神宗元丰四年（1081年）圆寂于宋都开宝寺。

成寻的弟子赖缘、快宗等5人则于次年（1073年）6月搭乘孙忠的船回国。宋廷托他们带给日本朝廷御笔国书，并赠金泥《法华经》及日僧圆珍国书中有“赐日本国”字样，日本人感到在外交上受到了轻视。直到5年后，即1078年，日本才派通事僧仲回带着织绢200匹、水银5000两，作为对大宋的回礼，再次搭乘孙忠的船入宋。此事在《宋史·日本传》及日本史籍《百炼抄》中均有记载。

博多出现“中国城”

日本在藤原时期对海外贸易采取了消极的闭关锁国政策，严禁本国居民私自出海贸易。如后冷泉天皇永承二年（1047年），筑前人清原宇武因私自赴宋，受到严惩；货物没官，本人流放佐渡，随从人员被处以徒刑。

但日本政府并没有禁止宋商前去贸易，故这一时期往来于中日航线的大多是明州商队。据日本学者木宫泰彦考证，明州商人孙忠、朱仁聪等17人先后多次往返于明州与日本之间。台州商人周文裔、泉州商人李充、福州商人陈文佑等，也以明州为基地，频繁与日本开展贸易往来。

最初，日本政府按照唐代旧例，在鸿胪馆安置宋商，供给衣粮。后因来船太多，不胜负担，便不再设馆接待，并规定每个宋商到日本贸易必须间隔两年。但很少有商人遵循，他们往往以“遇风漂至”等为借口提前来日贸易。

如宽弘二年（1005年），当明州商客曾令文到日本时，日本史籍《小右记》有这样的记载：“八月二十一日，左大臣、右大臣、左兵卫督议云：宋人来朝，应定年期，业给官府有案。其不待期早来而应逐回者，是否应按官府逐回？如有宋人申请候得便风便行罢归，因而获得许可者，虽有逐回之名，因循一二年，实无异于安置。若然，则应否一律予以安置？二十四日庚子，左头中将赖定来谈云，宋人应予以安置。”由此可知，为了获取利润，确有宋商在不到规定期限便前往日本贸易的，故《小右记》《百炼抄》均载有宋商船只被责令载着原封货物返航的事例。但如果因风向不便，宋商提出要在当地等候季风的话，日本人还是会允许其滞留，并给予妥善安置。

11世纪前半期，日本接待宋商的地方主要是鸿胪馆，并在此交易，而到11世纪后半期，鸿胪馆失火，贸易地点就转移到了博多。

宋商团的贸易以青瓷和丝织品为主。越窑青瓷制作精美，丝织品质地优良，做工讲究，尤受日本人喜爱。除了青瓷和丝织品，还有典籍、佛像、中药材、香料和其他工艺品，从日本则带回沙金、铜、硫黄、刀剑等产品。

如今在博多，人们发现了很多宋商卸货船留下的遗物及宋商在岸边交易时扔下的破损货物，大多是陶瓷器，是用来装香料、染料、砂糖等中国造的罐和壶。上面有“张”“李”等中国人的姓氏及表示商人集团的“陈纲”“王纲”等字样。

从日本文献中可以得知，在12世纪的博多，出现了叫“中国城”的“博多津唐房”。这些房子是11世纪后半期到12世纪前半期在博多滨西部形成的。而唐房的东侧有日本居民居住，也有宋商的墓地。据考证，这些房子是日式风格，屋檐装饰使用的是中国风格的瓦，使用的餐具是中国的青瓷和白瓷，墓地的式样是宋商自己设计的，他们接受的是日本净土宗的信仰，但同时也向明州的寺院捐赠钱物，以维系和故乡的感情。到了12世纪后期，他们就和日本人混居在一起了，还和日本人通婚。博多逐渐发展成为港口城市，成为宋人和日本人杂居的贸易都市。

由于宋日之间的贸易是由宋朝明州商人唱主角的民间贸易，这使当时的日本经济完全融入宋朝的货币体系。宋商们有时还客串两国使节，扮演官方角色。他们在日本（博多）落地生根，建造唐房，由“岸边交易”发展成“住番贸易”，博多逐渐变成宋商的营业据点。后来，这些明州商人的子孙又充当了元日贸易的主力。宋代这种频繁的民间海上贸易构成了一个东亚海上贸易圈，可以说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巅峰。

这就是唐宋时代雄霸海上的“明州商帮”。自此以后，浩瀚的海洋，为一代又一代的宁波人提供了纵横驰骋、扬帆异域的舞台，催化了生存繁衍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向外探求、积极开拓的意识，铸就了宁波人以海为怀、向海而生，敢于开潮、敢创大业的精神特质。从唐宋的“明州商帮”到近、现代“宁波帮”，再到“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先行区，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源远流长、持续发展，宁波港已从木帆船时代的古港，华丽转身为世界顶级大港，焕发出日益蓬勃的活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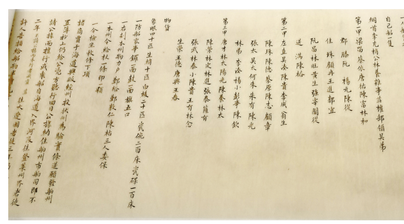
往事越千年，宁波是名副其实的海上丝绸之路“活化石”。

唐和义路码头遗址出土的越窑瓷器，唐宋时为海外贸易的大宗商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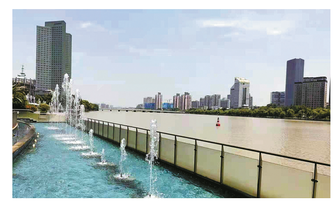
高丽商人入明州情景图。

普陀山不肯去观音院。

宋代高丽使馆遗址。（祝永良 摄）



宋代明州市舶司签发给泉州客商李充往日本的“公凭”。


战船街宋代造船场遗址。《鄞县通志》载，“战船街……宋时造船于此，故名。” （祝永良 摄）

注：本文史实除文中注明出处外，主要参考了《旧唐书》《新唐书》《宋史》《续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长编》《鄞县通志》《鄞县志》《浙江通史》《宁波通史》《日中文化交流史》等文献及宁波博物院、庆安会馆内陈列的相关资料。

（本文图片除署名外，均为从宁波博物院、庆安会馆翻拍的资料图片）